

改组、政局与发展:1913—1927年 中国国民党在云南的组织形态

段金生

【摘要】由同盟会改组的国民党,其在云南的发展,由于本身内部分歧较多,加以云南地方执政者对国民党的抵制,长期陷入低谷。中华革命党在云南的发展,在护国运动时期曾有过短暂的恢复,其余时间都受到了唐继尧的严防而事实上陷入停滞状态。中国国民党时期,1919年至1923年间的发展处于“地下”状态,1924年“一大”后虽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有进步,但仍相当涣散及薄弱。这些发展过程表现出两个特点:一是国民党自身一直无法克服其组织发展“先天营养不足”的缺陷;二是北京政府时期的云南地方实力派对国民党的态度主要以自身利益为取舍,在某种程度上呈现了国民党组织发展一直受地方实力派态度影响的客观情况。这些既是民国政治经纬极其复杂的重要表现,也是国民党组织建设及其后建立的党治政体政权脆弱的历史渊源。

【关键词】国民党;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云南

【作者简介】段金生,云南民族大学科技处(昆明 650504)。

【原文出处】《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京),2023.2.105~11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南京国民政府与滇川黔地方关系研究”(14CZS055)。

政治变革是近代中国复杂时势中表现最为剧烈的内容之一,而在近代中国政治变革诸端中最突出的景象则为政党政治的萌芽与发展。孙中山在1913年就言:“国家必有政党,一切政治始能发达。”^①在近代中华民族求强求富的复兴目标追寻中,一批先进人士尝试通过各种方式挽救国运,西方的政党及其政治运行模式成为学习的对象,并在清末民国时期得到实践与发展。张朋园就观察到,早在1840年前后,一批传统绅士、政府官员就开始了解西方议会政治,加之来华传教士的传播,西方政治观念在清末民初得到发展。^②西方议会政治的重要载体政党,也在清末民初得到发展,同盟会的成立即是这一发展进程的重要表现内容。由同盟会发展演变而来的中国国民党,在1927年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这一党治政

体政权,从另一维度呈现了政党在近代中国政治发展中的复杂性、重要性。国民党的组织发展历程错综复杂,在不同阶段,国民党的组织经历了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及中国国民党的嬗变历程;在不同区域,其组织发展的程度也差别颇大。关于此点,学术界已多有关关注。^③在民国尤其是北京政府时期呈现的政治区域化场景中,西南滇川黔诸省的形态颇有代表性,^④而云南因其邻边、地广、政治经济相对边缘等特点,政党在这一区域的发展,既呈现了与全国政治图景一致的普遍性情况,也表现了西南区域的特质性内容。民国有论者就言:“云南为一偏僻之省区,过去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均不能与内地并肩前进。”^⑤笔者曾撰文对1905—1912年间的同盟会及1927—1937年间的国民党在云南的组织发展进

行过阐述,^⑥此处拟结合学术界既有研究成果,根据相关档案、报刊等资料,对1913—1927年间国民党的早期组织嬗变过程进行勾勒,从整体的视野呈现国民党组织在云南的主要发展脉络,以期透视国民党政权统治整合力不强及脆弱性的历史渊源与区域特征,加深对民国政治发展复杂性的认识与理解。不足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改组与发展:国民党在云南的组织形态(1912—1913)

诚如时人所论,“言云南之党务,必溯始于清末之革命运动”。^⑦关于同盟会在云南的发展,笔者曾有过专文讨论,此处不作详论。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鉴于国内政治格局的演变,同盟会于1912年8月13日,与统一共和党等党派联合发表《国民党宣言》,宣布合并为国民党。8月25日,“国民党开成立会于北京”。国民党本部设于北京,“设支部于各省及海外各埠”。^⑧“滇省应之”,李根源被推举为云南支部长,赵伸及袁家普则被推举为副支部长。^⑨国民党与同盟会之关系,孙中山在1914年有过阐述:“国民党为同盟会之产儿,同盟会为革命党之元素,其精神主义乃始终一贯者。”^⑩

国民党云南支部成立后,一方面党员发展规模较为迅速,另一方面在组织建设上则十分涣散。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重要目的是为了在政党林立的背景下尽快壮大同盟会的力量。于是,在成立后就“不择手段吸收异党分子”。^⑪国民党云南支部在党员发展上也采取了这一方式。同盟会云南籍会员杨友棠^⑫就言,“同盟会与五党合并,改组为国民党,时值吾党声势盛大,又在选举国会议员期间,故其声势甚顺”。在此情景下,“李根源、罗佩金、谢汝翼、李曰垓等首倡之,与同志赵伸、谢佩青、陈时铨、张大义、李文治等主其事”,短期内云南的国民党党员数“达千余人”。杨友棠认为,“此可称为云南党务极盛时期”。^⑬然而,正如邹鲁称国民党成员“龙鱼杂处,真伪不分”,^⑭在云南加入国民党党员的成分也十分复杂,既有统一党及共和党党员,也有一些地方士绅。李曰垓、李文治等人虽积极倡导吸收国民党党员,但

他们本人则为统一共和党云南支部的重要发起人或成员。^⑮还有,“绅耆、道学派之赵藩、孙光庭等,亦加入党籍”。^⑯对此,民国时期编纂的《续云南通志长编》就称:国民党云南支部成立后,“唯以统一党及共和党党员之属人”,从而“分子复杂,意志涣散”,认为“对于党务殊无若何之推进”。^⑰

国民党成立后,积极参与首届国会选举,并占据了优势,在云南亦复如是。国会众议员选举云南额定名额为22人,其中国民党即占19人。^⑱然而,宋教仁被刺案爆发,二次革命发生,国民党被袁世凯强行解散,国民党之命运急剧直转,国民党在云南的境况也发生了变化。国民党本由同盟会演变而来,源于同盟会内部松散,会员群体复杂,国民党为争取在议会选举中获胜,更是广纳党员,不仅不能解决同盟会原来内部成员之间的复杂关系,并且进一步扩大。云南的国民党内部也甚为复杂,加以政治形势及各自见解差异,相互间分离或敌视心理较大。

当时,云南都督蔡锷与贵州都督唐继尧都倾向于支持袁世凯。1913年12月,参加过腾越起义的哥老会领导杨春魁率领大理地区的哥老会成员及部分驻军,“声称奉孙文、李根源等命令”进行二次革命为号召,发起武装反对袁世凯的活动;同时,还致电李根源、张文光等到大理“共商南北分治”。^⑲杨春魁自称“奉命讨袁军司令”,其领导的军事力量先后占据邓川、洱源、漾濞数县,但很快被唐继尧派遣谢汝翼击败。杨本人被擒枪决,其他被牵连者众多,“袁庶熙被捕,判有期徒刑六年,讲武陆军生,如杨尽(荇,引者注)诚、刘振武等,亦死事多人”。杨友棠认为这是国民党在云南发展的“一悲剧”。另外,张文光虽已经解除了大理提督职务而“家居赋闲”,并声言将到香港、上海游历,“实未与闻讨袁军事”,但施继伯、谢汝翼“不念同志、兴其前功,竟以除后患为言,将其谋害”。张文光本为哥老会成员,其死导致“凡属哥老会同入,此后相戒,无一人加入吾党(指国民党,引者注)矣”。^⑳按照新加坡《国民日报》的报道,张文光被杀之日,“方浴于腾越城南硫黄塘中。一军官奉唐继尧、谢汝翼命,率兵士二十余人,就而

毙之”。因此,该报道质疑若张文光参与大理反袁活动,“岂有大理已覆败,犹从容与人同浴”之事,认为此系“政府(指云南省政府当局,引者注)遂得假手(指借杨春魁反袁事,引者注)以杀义士”行为。^②在内外困境下,国民党云南党支部的发展很快也陷入低谷。

唐继尧入黔后任贵州都督,在蔡锷入京后回滇继任云南都督。关于唐继尧在督滇前后对国民党的态度,杨友棠在1924年对此有详细论述。杨氏称:唐继尧在黔督任命过程中,“杨尽(苾,引者注)诚与之相争于前,又有黔军、席聘臣相与交战”,后“均依北京政府为之主持袒护,得保其地位”,而袁世凯亦对其笼络利用之。认为唐于是时,“实际上已脱离同盟会,而且甚嫉视本党同志,冀泄其私愤”。因此,唐继尧督滇后,对于国民党(同盟会)的同志,“时欲得之甘心,有位置者,则加以藉端撤委;无位置者,亦时以侦探伺之”。杨友棠的论述表明,唐继尧在督滇后,对国民党力量排斥甚力。尤其是当迤西镇守使谢汝翼于1914年奉袁世凯召见,在去北京的途中被暗杀,使云南各方人心惶惶。其中,就有猜测谢汝翼为唐继尧主使所杀,导致“狡黠者,则早自脱党(国民党,引者注)表示归诚,始侥幸免于难”,出现“军政界人无一敢称是国民党”的情况。^③用李宗黄之语,此景则是:“癸丑(指1913年,引者注)以后,唐继尧对于党人驱逐杀戮,无所不至。”^④国民党此时在云南的活动实际上陷入停滞。

二、中华革命党在云南的组织与发展(1914-1919)

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忧愤交集,不忍见二十余年艰难缔造之革命主义未达,遽尔不振,乃亲率能立于战线之党员,组织中华革命党于东京”。^⑤1914年7月,中华革命党在东京正式成立。是年10月7日,委任杨益谦为中华革命党云南支部长。次年2月15日,孙中山委任周知礼为云南支部长。1915年5月5日,又委任寸海亭为云南缅甸分部长。而后在1915年至1916年间,又委任明星辰为云南军事联络员。在1915年10月8日,又颁发了云南司令长官印一枚,但相关资料未显示任职者为何人。^⑥据有学者

的统计表明,当时中华革命党在国内共设立支部20个,海外共设支部41个;^⑦而有学者则考证认为中华革命党共设立了164个分部。^⑧

中华革命党是在革命低潮时成立的,由于二次革命的失败,国民党被袁世凯取缔,革命派内部之分歧颇为严重。孙中山认为讨袁之役失败的原因主要在于党员不听他的话,对其革命同伴黄兴曾直言二人“彼此主张已极端冲突”,对黄兴不愿贯彻其讨袁部署计划十分不满,表示此为“弟(指孙中山,引者注)所不满于兄(指黄兴,引者注)之处也”。^⑨故在组织中华革命党时,要求写誓约、按指印,这引起部分国民党党员的抵制,拒绝加入中华革命党,并另组政团。1914年8月13日,部分在东京的国民党党员以讨论欧洲战争为名,成立了“欧事研究会”。原国民党云南支部长李根源即是其中重要成员。对于李根源的这一行为,《续云南通志长编》中这样论述:国父孙中山以国民党不能为用,决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但严格规定入党手续及宣誓办法;“时滇省国民党主持人李根源已再度离滇赴日留学,旋组‘欧事研究会’,正式脱离中华革命党”。事实上,中华革命党的发展本身就步履较缓、内部分歧颇重,严重影响着其在云南的组织发展。是时,主持滇政的唐继尧亦脱离国民党,改隶共和党,与“新兴之中华革命党人不协”;而“革命党人之所为,亦多不择手段,以致双方互不相容,迭起摩擦”。^⑩有研究显示,1914年12月之前,中华革命党的入党党员有1824人,而云南籍的中华革命党党员仅22人。^⑪

正如有研究者认为由于中华革命党处于秘密活动状态,难以对其党员进行一个较为全面的统计。^⑫据笔者目前所阅资料,尚未见有关中华革命党在云南发展情况的具体论述。不过,前引《续云南通志长编》中所述的当时云南政情,或可推测出中华革命党在云南的组织发展规模不可能太大。虽然中华革命党在云南的具体发展状况无法进行细致描述,但通过一些资料的表述,或可以窥其大要。

据资料记载,1914年冬间,中华革命党总理孙中山特派杨华馨、蔡济民、明超伯三人回滇,进行中华

革命党发展事宜,但“未几事泄”。而后,“蔡济民、王荫南(应是中华革命党在云南的党员,引者注)两同志被唐(指唐继尧,引者注)逮捕枪毙”,其借口是“搜出密电本,显谋不轨”。其他党员则因杨华馨营救甚力得以幸免,但“实为永远监禁”;其中杜若泉、明超伯、杨向葵、刘德泽等人,则冒险得以脱身。而在1915年夏,因袁世凯授意筹安会散播恢复帝制的消息日渐传开,吕志伊、杨友棠“乃密相约分途归滇,有所筹谋”。吕志伊刚入昆明,唐继尧即将其拘留入省警察局;而杨友棠刚到永昌(今保山),亦被拘禁,其罪名为“阴谋运动军队”。唐继尧这一行为,引发“一时舆论哗然”。再因罗佩金、张含英等营救,唐继尧有所顾忌,最后将吕志伊释放,杨友棠则递解回籍,由地方官监督管束。^③吕志伊与杨友棠长期以来与孙中山关系密切,孙中山组建中华革命党,他们加入了该党。他们回到云南即被唐继尧拘留,说明唐继尧严防中华革命党在云南的发展。上述内容间接证明了《续云南通志长编》论述中华革命党在云南的发展状态虽较粗略,但符合实际。

黄兴在论及中华革命党在美国旧金山等海外的发展情况时曾言:“国民党之招牌尚存。而青年党员于为国民党党员之外,又有填写誓书为中华革命党党员者;惟老成者尚多反对,故国民党内潜伏此两派。”^④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虽然大部分国民党党员表示支持其决策,但仍然有部分党员表示反对。事实上,对于原国民党党员及改组后的中华革命党党员,实难以截然划分。杨友棠就明确认为护国及护法运动期间,“变乱非常,局势不定,所属同志亦多分散,出入无常”。^⑤此论应是这一时期中华革命党发展状况的真实反映。

但在护国运动后,中华革命党在云南的境况有所变化。1915年冬,“筹安会发生帝制风潮”,形势日渐紧张,“凡属同志,尤见义形于色”。当时,云南“在省同志罗佩金、赵藩、吕志伊、赵仲、叶荃、邓泰中、徐进、杨蓁、董鸿勋等奔走呼号,献替可否,颇为尽力”。而蔡锷、李烈钧、戴勘、熊克武、韩凤楼、刘云峰、方声涛、但怒刚、杨友棠、杨益谦、张文艺、杨化中

等人亦先后到滇,“与唐继尧决议宣布独立”。自此,“入于军事状况,所有同志已尽数分途从戎,入川赴黔出桂经粤,其中以讲武、陆军两校员生义勇忠烈,战功彰著”。张开儒、顾品珍、赵钟奇、赵又新、黄毓成、何海清、朱培德、王秉钧、戴永萃、王树藩、李天保、鲁子材、张怀信、田钟谷、金汉鼎、杨希闵、范石生、周自得、李植生、刘国祥、李识韩等人“转战数省,所向有功”。上引未明言所列举的人物是否加入中华革命党,但其中很多是原来同盟会成员,还称“十(之,引者注)七八是吾党同志”。^⑥这正是此时云南革命同志“出入无常”的真实表现。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孙中山认为“破坏既终,建设方始,革命名义,已不复存”,中华革命党本部遂于1916年7月25日,向国内外各支部、分部发出“一切党务亦应停止”的通告。^⑦此后,中华革命党虽然其活动仍然维系,但事实上陷入停顿。^⑧而云南在护国运动后,唐继尧对革命党的态度虽有改观,但革命组织在云南仍难展开。李宗黄就言:“讨袁之役,(唐继尧,引者注)因复走入革命之路,稍改变从前态度,然皆敬鬼神而远之,不使有活动之余地。”^⑨

三、复杂政局下的曲折发展:中国国民党在云南的构成及活动(1919-1927)

孙中山虽然将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但也面临着严重的认同问题。邹鲁就言,中华革命党成立以后,虽然精神团结与日俱增,但海外支部的发展面临着“因居留政府立案关系,仍多沿用国民党名义”,而国内“亦未明白党已改组,原日国民党员,不少在本党旗帜下奋斗”,致使“国外有名实不符之病,国内有实至而名未归之嫌”。^⑩其时,“党的名称难于统一”,到1919年,各地党部都还有或称“中华革命党”,或称“中华国民党”及“中国国民党”的现象。^⑪综合各种复杂因素,经过长期的酝酿与准备,1919年10月10日,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中国国民党成立后,其在云南的发展经历了曲折的过程,直至1930年3月11日,才正式在云南成立了省党务指导委员会。^⑫

(一)1919-1923年的“地下”发展状态

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之时,正值南北和谈之际。事实上,此时国内政局的核心主要是南北军阀之间的博弈,政党活动尚不居于显要地位。其时,孙中山正忙于在南北军阀之间周旋、博弈,其本人于1920年5月16日在上海国民党本部演讲时也坦承:“本党(指中国国民党,引者注)自改组以来,我因有许多别项事故,不能常在本部专心办理党务。”^②基于诸多复杂的原因,中国国民党此时的党务发展并不顺利。

讨袁之役爆发后,唐继尧对革命党人的态度虽有所改变,但并未发生根本变化。因此,此时国民党在云南的活动仍不乐观。唐继尧对云南境内的思想文化控制十分严密。王复生、杨蓝春就言:“本党(指中国国民党,引者注)宣传图及新滇社出版之《革新》《铁花》,云南青年社出版之《云南青年》,云南旅京学会出版之《云南》,留日学生刊印之《曙滇》,完全扣留销毁。其他国内新出版之书籍,列为禁书者八十余种,一概检出没收……只须提到唐继尧三字,无论为毁为誉,便干禁忌”,导致一般云南民众思想十分禁锢,对于世界潮流、国际状况、国家地位则“完全模糊”。^③二人所论虽然并没有精细地将唐继尧严防中国国民党的具体做法一一言明,但从中也可窥出当时国民党在云南的发展不易。

杨友棠于1920年在云南的遭遇,也颇能说明唐继尧时代国民党组织在云南发展的困境。1919年10月,孙中山虽然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但由于党务发展事实上非常缓滞,一些地方还以中华革命党的旗帜进行党务活动。例如,1920年初,湖南革命党人仍是以“中华革命党”的名义,与当时的湖南都督张敬尧协商政事。^④1920年1月,杨友棠受孙中山派遣,回滇发展党务,但“甫到省数日”,即被唐继尧“亲笔下条”交由宪兵司令部严拿。其后,碰巧命令才下,唐继尧即被顾品珍发动兵变推翻下台流亡香港,杨友棠才“幸得无恙”。这带有戏剧性的过程正体现出唐继尧对国民党组织在云南发展的严防态度。按照杨友棠所言,他被放出后,因家中有事,故与吕志伊相商,“将党务事托交旧同志马幼伯(即

马骧,引者注)代理,有杜钟畸、崔文骐两君助之”。^⑤这与国民党组织涣散,旧同盟会党员、中华革命党党员之间“出入无常”的状况吻合。

顾品珍发动政变,迫使唐继尧离滇,国民党在云南有了个短暂的较快发展时间。在顾品珍当政时,中华革命党才得以在云南正式挂上招牌,“渐渐有恢复希望”。杨友棠言这一时期,在马骧(即马幼伯)的努力下,招进了新党员将近百人。^⑥顾品珍逐唐后,孙中山以“滇局既定”,特派吕志伊、杜钟奇、何畏、张元养、彭嘉犹等回滇,与顾品珍筹商北伐大计,顾亦“概允出师”。杜钟奇、马骧、刘古愚、鄢仕周、李成武、李梧、崔铁君、铁汉、黄嘉梁、杨大铸、唐允仪、邓质彬等则奉孙中山之命,准备在云南积极整理党务。然而,好景不长,唐继尧离滇后,再次组织力量返滇,顾品珍战死,滇政复归唐继尧。此时,云南的革命同志虽然想继续发展党组织,在云南密组云南同盟会及云南自治讨贼军,但很快即遭到唐继尧镇压。^⑦

唐继尧二次返滇后,对国民党人的敌视“较前尤甚”。国民党在云南所办《滇声报》的党员唐质仙、杜钟奇、钟莹如、胡盈川、丁怀瑾等被迫逃匿殆尽,而后马幼伯等人“误招引土匪吴学显部下支队长另一同名异字者杨有堂入党”。引进帮派人士入党,这一“在他省为一寻常之事”的举动,却给了唐继尧口实,乃“藉故加害”。1921年农历7月11日,唐继尧一方面派人将马骧、崔文骐、鄢世周(档案中应为鄢仕周的误写,引者注)、刘古愚、李成武等5名正在昆明南门外进行筵席的国民党同志逮捕,一方面又派队搜捕马骧的寓所,将国民党在云南的一切党证、名册收去。然后“不设法庭、不加审计”,以“改造云南运动军队字样”,于翌日12时将马骧等5人枪毙。这对国民党在云南的发展打击尤大,杨友棠称此为“云南国民党籍上所当大书特书纪念为一大悲惨之剧也”。^⑧除了上述5人被杀外,铁汉被唐继尧逮捕,病故于监狱;邓质彬、邓可庄、栗飞鹏皆先后被拘入狱,2年后始放;张愚公则被殴几死。这样,国民党在云南的“党务前途,顿形暗淡”。^⑨

正如有研究者所强调的,由于孙中山等国民党

领导人在广州革命政府中身兼军政要职,工作中心是行政与军务,尤其是1921年4月7日孙中山由非常国会选举为大总统后,军政事务重,党务建设事实上并不突出。^⑤有研究者更认为:1916年中华革命党暂停党务后,党组织更复涣散。1917年之后进行的护法运动,一般只知有孙中山以广东地方力量和西南诸实力派相结合的势力,而国民党则鲜为时人提及。^⑥国民党领导层的精力无法顾及党务发展,而云南唐继尧又对国民党的组织发展防范严密,国民党在云南发展的阻力甚大。

在1921年唐继尧被迫下野后,孙中山就曾对东方通讯社的记者称唐继尧是“西南的新军阀”,始终不肯跟其合作从事革命。而在李宗黄面谒孙中山时,孙中山又直言唐继尧“这个人头脑太旧,军阀习气太深。他一方主张护法,一面主张联省自治,目的就在于割地自雄。他的所作所为,跟北洋军阀又有几大的差异”。这一谈话,颇能清晰道明双方隐藏在合作关系背后的复杂性。唐继尧被迫下野后,与孙中山接触时表示愿意合作,然而私下却又言:“孙中山创造共和,我唐某人再造共和,让我们两个分庭抗礼则可,要我当孙中山的部下,那办不到”;“孙先生创造共和我唐某人再造共和,我们两个都是有功于民国的人,所以我不能当他的副手”。^⑦缘于唐继尧这样的认识,前述其对国民党采取的态度与手段,则当属自然。

唐继尧二次掌权后,孙中山也遭遇到了革命征途中的重要挫折,陈炯明叛变,迫使其不得不离粤赴沪。在驻粤滇军张开儒、杨希闵、蒋光亮、范石生、朱培德诸人的支持下,孙中山平定了陈炯明叛乱,于1923年2月返粤成立了大元帅府。^⑧此时,孙中山邀请唐继尧任副元帅职,唐虽表示“孙公在党为唯一领袖,在国为开创元勋,竭诚拥护,始终不渝”,但“惟副元帅一职,名分较崇,愧无以应”,表示不愿履职。而后孙中山委唐以川滇黔三省联军总司令职,唐才宣布就任,表示与广东方面一致采取北伐行动。^⑨副元帅一职于唐而言,名义大于实际,而川滇黔司令,却可以利其“大西南主义”的实践。事实上,此时孙、唐

虽表共同合作,实际各有打算,唐继尧对国民党在滇发展党务仍然严防。其时,时局之演变使孙中山对党务工作有了新的认识,1922年秋表示要“制订国民党的新政策”。^⑩而后,孙中山逐渐确立了联俄、联共方针,并于1923年1月1日在上海发布《中国国民党宣言》,宣布改进党务;11月25日,发表《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而在此过程中,云南党务并不顺利。云南籍国民党党员杨大铸亲历了这个过程,他言:孙中山改组党务,但云南仍处“唐氏高压之下”,国民党在滇党员“除先后遇害者外,多半出亡外省”。国民党党员李伯东、邓质彬等都曾先后派员到广州国民党总部请示具体办法,孙中山以云南情况特殊,“密谕继续秘密进行倒唐工作,相机应付”。^⑪国民党此时在云南的发展处于一种地下状态。

(二)国民党“一大”后的发展(1924-1926)

1924年1月20日,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开幕。孙中山在开幕式上发表演讲,称此次大会“是本党自有民国以来的第一次,也是自有革命党以来的第一次。我们革命党用了三十年的功夫,流了许多热烈的心血,牺牲了无数的聪明才力,才推翻满清,变更国体。但在这三十年中,我们在国内从没有机会开全国国民党大会。所以今天这个盛会,是本党开大会的第一次,也是中华民国的新纪元!”^⑫孙中山对大会的召开寄望甚殷。而正如相关研究表明:从兴中会、同盟会一直到1924年,国民党活动的主要基地和党员基础,主要是在海外;1923年前后,国民党共有党员20余万,其中国内党员不到5万;组织机构共计400余处,亦多设于海外,国内除广州、湖南设有支部外,其他省区并无正式的组织机构。而在改组后,国民党逐渐有了从中央党部、省党部到县党部等各级机构,党务发展组织亦风起云从。^⑬不过,云南党部的发展却较为曲折。

按照规定,国民党“一大”各省的代表名额是6人,但须由孙中山指定代表名额的半数,而另一半则由各地党员投票选举。孙中山指定的云南籍代表是李宗黄、杨友棠和胡盈川;其他3名代表周自得、杨华馨、刘国祥,则是由在广东的云南籍党员选举。出席

此次大会的云南籍代表李宗黄曾言：云南籍的6位代表中，杨友棠、胡盈川早年在日本即已加入同盟会；周自得时任滇军总司令部参谋长，系新近入党；杨华馨、刘国祥则是中华革命党党员；6人之中，仅李宗黄在从同盟会到国民党的组织嬗变中“始终一以贯之，从未脱节”。在大会召开过程中，李宗黄和周自得负责供应其他4人的交通工具，以及他们在穗期间所需要的各种费用；在各省代表向大会提交各省党务发展报告时，先由云南新来的胡盈川、杨友棠2人负责起草报告全文，然后由李宗黄审阅。^⑤按上述所言，除孙中山指定的代表外，其他3名是由在广的云南籍国民党党员选举而来，而不是在云南本地选举；其中又仅杨友棠、胡盈川是从云南出发而来，其他或就在广州，或从他地而来。这些都表明，此时国民党在云南的党务是十分脆弱的。在此次大会上，云南籍的杨希闵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李宗黄则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⑥

国民党章程规定全国代表大会一年举行一次，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应在1925年1月召开。不过，因孙中山北上后病逝于北京，再加上1925年初的广州东征及驱逐在粤滇、桂军队迭次用兵，其间又发生沙基惨案、省港大罢工，致使第二次大会延期。直到1926年1月4日，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才得以在广州召开。^⑦李宗黄所言国民党二大推迟召开的上述原因客观存在，但国民党上层的分裂亦是重要原因。事实上，孙中山在世之时，国民党上层已经存在分歧，孙中山病逝后，国民党上层分裂加快。而后，“西山会议”派在上海推出国民党“上海中央”，并在1926年3月召开了上海“二大”。而在1926年1月，广州中央召开了“二大”。在广州“二大”上，云南籍朱培德当选为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黄实当选为候补委员。^⑧云南籍的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杨希闵已被驱逐出粤，而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李宗黄则因家庭原因未能参加广州“二大”。^⑨据相关资料统计显示，到1926年10月，国民党在全国约90%以上的省区建立了省级党组织。^⑩有学者将这一状态称为“国民党由一个偏处海外的狭隘组

织，发展成为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以国内民众为基础的动员型政党”。^⑪但在国民党省党部普遍建立的这两年时间内，云南省党部却未能建立。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将大元帅府组建为国民政府。此时，唐继尧仍对国民党采取敌视态度，欲假“讨赤名略两粤”，^⑫双方关系仍未缓和，国民党在云南的发展仍处地下形态。这一时期，国民党在云南的组织发展，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在云南也形成了反对帝国主义与军阀的革命新局面，这也引起了唐继尧的敌视，为防止“国共两党势力进一步渗入云南，加紧了‘反赤’行动”。^⑬唐继尧指责国民党“为赤化”，继续“严厉制止关于本党（指国民党，引者注）之一切宣传组织之活动，凡属总理遗著及各种宣传品，均被河口检查机关焚毁”，并“通令各印刷所及书局，不得印行发售”；还“派大批便衣侦探侦察各学校之集会情形，随时勒令解散”。^⑭为抵消国民党的宣传，唐继尧还利用国家主义派张劲、张介石等，组织民治党，设立民治学院，发行《民治日报》。^⑮国家主义学说在当时云南曾产生过影响，“教育界亦有少数受国家主义者之宣传，从事附和，专事造谣告密”。^⑯“国家主义横行，民治党之谬误主张，统治一切。本党（指中国国民党，引者注）之宣传组织，横遭禁抑，一般民众宜若无由认识本党矣”。^⑰1926年7月28日，唐继尧还大举抓捕国民党人，当时国民党派到云南的特派员杨蓝春（实为共产党员）被通缉，被迫逃避于麻栗坡。^⑱唐继尧对在滇国民党的持续打压，加以国民党组织自身的涣散，在滇的国民党党员发生了分化，个别党员为保全自身，附庸于唐继尧。王复生等就言，当时任云南省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的张禄（即张服真），曾是国民党派遣到云南工作的特派员，^⑲但依附过唐继尧。孙中山在世时，唐继尧曾“剽窃本党名义，组织御用的云南国民党俱乐部”，张禄就曾为该俱乐部一员；为“维持地位之故”，张禄还“不惜诬校内同志之活动为赤化，指为范石生侦探（此在滇为攻人最毒之语）”，并且“公然鼓吹国家主义”。^⑳不过，在云南的一些国民党党员亦捕捉到唐继尧的统治存在严重内部危机，也积极活动，准备倒唐。李伯

东、李表东、董成志、张仁怀等人，于1926年9月派遣杨春洲、刘琨府(化名黄子仁)到广州与国民党中央接洽。时任广州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总参谋长李济深在了解云南党务发展情况后，“密令滇同志楚昌南及川同志王继孔(二人为黄埔四期学生，引者注)，偕刘琨府绕道入滇，与李伯东等密组云南临时军政委员会”。10月，在昆明西山高尧杨升庵祠堂秘密开会，云南临时军政委员会成立，李伯东、彭嘉猷、楚昌南、张仁怀、董成志为执行委员，其中以李伯东为主席。因国民党中央一时无法接济经费，由李伯东及其弟李表东变卖私产筹款6万元“为组织武装民众之用”。^⑤其中，积极宣传革命活动的王复生、杨青田等人，均为中国共产党党员。^⑥

关于1926年前后云南的国民党党组织具体建设情况，笔者目前所见资料，对其内容尚无法完全勾勒出来，并且随着其后国共分裂影响，部分材料的说法彼此颇为矛盾。1926年某月，国民党青年部党员赵文涛向国民党青年部报告其与云南代表学生毕昌杰的谈话，颇能反映当时的一些情况：

其一，云南全省在1926年1月前没有国民党党的组织。“所有自号为[国]民党的都是已往的同盟会时代的同志，现在已完全变成反革命了，终日勾结唐继尧，与之狼狈为奸，以压迫人民为事”。

其二，在1926年的某月初，国民党昆明区党部始正式成立。“党员之大多数，为云南各地学生所组合之青年团全体团员，后又加入少量的他界同志。现共有同志百余人，学生占百分之八十，工商占百分之二十，农民则尚无加入者。该区党部因为成立甚晚和党员之不集中的缘故，区分部迄今尚未划分清楚”。不过，在昆明区党部正式成立前，在1925年7月间“已曾□生过一次组织，组织之□生，系上海学联会派去张永和、何鸣九二同志以组织学生联合会之任务到云南，顺便组织。故该组织下共有同志七人，因形式不完备，故亦没有名称”。

其三，现在国民党昆明区党部负责人为杨蓝春、王复生二同志，“徐(应为系，引者注)由中央派去者，(该二同志为北京某大学学生)”。

其四，因唐继尧对“本党衔恨太深，不让做公开的活动”，国民党在昆明党员的工作，“惟有秘密开会”。

其五，国民党昆明区党部内，“没有左派、右派之分，至如共产非共产之区别，则同志中尤无此种观念”。^⑦

毕昌杰是云南牟定人，1923年入省立一中读书，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他在1926年初，参与了反对把云南省师范学校及政法学校土地出售给法帝国主义的运动，率学生代表与省政府谈判，争回了两校校址。而后，为躲避云南当局的迫害，离滇到广州，参加了中共广东区委在大沙头举办的政治训练班，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2月回到云南，任中共云南特别委员会委员，分管组织工作。赵文涛与毕昌杰的谈话，应是毕昌杰到广州后之事。从上述谈话内容，与前引杨大铸在1929年所撰写的《中国国民党云南革命小史》对照，上述谈话涉及内容应在是年9月之前。当然，杨大铸所述的国民党在云南发展的内容，是严格按照仅有国民党党员单一身份者而论，较少涉及国民党“一大”后跨党党员发展情况。而毕昌杰的谈述内容，则可能将身份为单一的国民党党员及中国共产党跨党加入国民党的情况都罗列在一起。

这一谈话内容透露出以下信息：一是此时国民党在云南的省党部尚未建立，尚未有统一之组织机构。二是加入国民党者学生居多，而杨蓝春、王复生是国民党中央派去的工作人员，负责区党部，二人实为共产党员。三是国民党上层之间左派、右派的分别尚未明显影响云南。

在内外多重矛盾下，“倒唐”的二六政变发生。此时，国民党统一全国大势已现，胡若愚及龙云等人均选择与国民党合作，其后国民党在云南的发展有了进步。杨蓝春、王复生就言，“现因云南政局发生变化，在反唐势力之下，(国民党，引者注)渐能公开活动”，包括散发传单、粘贴标语等宣传活动都能在昆明公开进行，此是“党务发展之最好机会”。在这样的情况下，加入国民党者日渐增多，“统计省内同志

现在已增至四百余人”。同时,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决定从广州先派对工作较有经验的党员同志14人,入滇到省城及重要城镇分工进行党务工作。^③

对于上述曲折过程,国民党云南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在1938年的工作报告中,对二六政变之前云南党务发展有过简要总结:民国成立后,“革命风潮,如风起云涌,滇省党务,似有进展之可能”,然“无如当时执政者(指唐继尧,引者注),往往扭于私见,对本党主义,认识不清,不甚重视”,国民党改组后曾选派党务人员,来滇秘密活动,“但以形格势禁,迄无成功之希望”,直至二六政变后,国民党在云南才能公开活动。^④这证明了杨蓝春、王复生在1927年所言情况的真实性。

按照杨蓝春、王复生的报告内容,当时国民党在云南的400余同志之分布,以在昆明市者为最多(250人以上),省党部筹备处亦设此,其余散处在蒙自、个旧、阿迷(今开远市)、开化(今文山县)、石屏、大理、楚雄等10余县,多则数十人,少亦数人不等。“惟除蒙自、个旧外,大都不足总纲所规定之县党部的组织、人数”。基于这样的原因,“省党部迄未能正式成立”。他们预计省党部成立之期,最早也要在1927年4月以后。^⑤事实上,曾经有云南籍的同志提议省党部若一时不能成,可先到省外如广州、武昌或南昌成立临时省党部,但最后王复生等人考虑认为“惟此临时省党部成立之后,不过取得一空洞的名义而已,实际对滇省党务工作不发生若何影响”,而未采纳此议。^⑥

陈公博曾言:“在分共以前,无论何省党务,共(产)党派组织都做了(国民)党的核心。”^⑦有研究者也认为,“一大”后国民党对民众运动予以了前所未有的重视,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开展群众运动。中央党部先后设立了农民部、工人部、青年部、妇女部和商人部,作为领导民众运动的机构,工运、农运计划及相关的政策法规也相继出台,只是群众运动的实际工作多依赖参加该党的中共党员进行。^⑧国民党“一大”后,国民党在全国各地的群众运动得到较快发展,但云南由于唐继尧禁止国民党的活动,群众运动亦与国民党党组织在云南的发展状态一致,多为

秘密进行。1926年唐继尧还曾以“赤化”名义,逮捕了云南农民协会的委员,致使协会发出了“只有团结起来,组织在青天白日之下,农民协会之下,在国民革命的过程中,打倒一切军阀帝国主义者,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打碎束缚爱惜的枷锁”的宣言。^⑨直到二六政变发生后,学生、妇女运动组织才逐渐公开。^⑩这些活动都受到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国民党自身在云南的组织建设仍然薄弱。

自国民党改组到二六政变之间,国民党在云南的组织涣散,没有建立一个统一的党组织,其在云南的党务处于一种分散、凌乱状态。李宗黄在1927年2月27日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云南党务情况中就称:“惟云南党务既无根底,应将本党自改组后整个的组织,整个的方案,完全运用至云南。并应派最高指导者及筹备员,迅速集中人才,准备积极(应为积极,引者注)活动,与军事、政治同时进行,以谋根本之改造,似为急切之图。”^⑪此语说明了国民党云南党务发展相当薄弱。在二六政变后,以国民党名义在云南进行活动的组织有5种之多,^⑫直到龙云统一滇政后的1930年云南省党务指导委员会正式组织成立。^⑬

四、结语

由同盟会改组的国民党,其在云南的发展,由于本身内部分歧较多,加以云南地方执政者对国民党的抵制,长期陷入低谷。中华革命党时期,其在云南的发展,在护国运动时期曾有过短暂的恢复,其余时间都受到了唐继尧的严防,陷于停滞状态。中国国民党时期,1919年至1923年其发展处于“地下”状态,而1924年国民党“一大”后,其在云南的组织发展虽然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有进步,但仍然相当涣散及薄弱。

国民党的组织形态经历了复杂的嬗变,它的改组或名称变化,莫不与时局存在着密切关联。在民国尤其是北京政府时期,西南诸省地方实力派均对国民党的组织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1913—1927年间国民党、中华革命党及中国国民党在云南的组织发展过程,表现出两个突出特点:一是国民党一直无

力克服其组织发展“先天营养不足”的缺陷,导致其组织发展过程中出现党员“出入无常”的境况,这是其组织建设一直步履蹒跚的重要原因之一。二是北京政府时期的云南地方实力派,虽然无力问鼎全国,但一直在各派势力之间纵横捭阖,对国民党的态度,主要以其自身利益为取舍,并无坚定的政治立场。这在某种程度上呈现了自民初以来国民党的组织发展就一直受到地方实力派态度影响的客观情况,而地方实力派对其之态度主要视政局的变化而调整。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一现象。这些,既是民国政治极其复杂的重要表现,也是国民党组织建设及其后建立的党治政体政权十分脆弱的历史渊源。

注释:

①孙中山:《在上海国民党茶话会的演说》(1913年1月19日),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3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4页。

②张朋园:《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1909-1949晚清以来历届议会选举述论》,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第1-48页。

③关于国民党的组织发展历程,研究成果丰硕,此处不一一列举。其研究基本历程及概况,可参阅崔之清主编:《国民党政治与社会结构之演变(1905-1949)》(上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6-17页。

④段金生:《试论西南军阀地域范围流变(1916-1927)》,《史林》2015年第4期。

⑤陆崇仁:《告边疆行政人员》,见云南省民政厅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编印:《边疆行政人员手册》,1944年,第1页。

⑥段金生:《脆弱的统合之基:抗战前国民党在云南的组织与发展(1927-1937)》,《民国档案》2015年第2期;段金生:《政党演进与边疆政治:同盟会在云南的组织与发展》,《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5年第4期。

⑦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续云南通志长编》(上),昆明:云南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印刷厂,1985年,第356页。

⑧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上),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2011年,第121、139页。

⑨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续云南通志长编》(上),第357页。

⑩孙中山:《致坝罗同志函》(1914年12月30日),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147页。

⑪柏文蔚:《五十年经历》,《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3期。

⑫杨友棠(1880-1925),云南大理人,早年留学日本并加入同盟会。1924年1月1日,杨友棠作为《总理指派代表人名册》中云南三人代表之一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后留任大元帅府参谋。1925年病卒。

⑬《云南代表杨友棠等致一全大会秘书处报告》(1924年1月28日),中国国民党汉口档案:12901。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台湾“中国国民党党史馆”档案电子版,后面所引中国国民党特种、汉口档案,皆出此处,不另注明。

⑭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上),第138页。

⑮《统一共和党规约》,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昆明:云南新华印刷厂,1981年,第228页。

⑯《云南代表杨友棠等致一全大会秘书处报告》(1924年1月28日),中国国民党汉口档案:12901。

⑰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续云南通志长编》(上),第357页。

⑱崔之清主编:《国民党政治与社会结构之演变(1905-1949)》(上编),第167页。不过,张玉法的研究则认为,国会选举中,参议员云南额定10席,国民党占据6席;众议员云南额定20席,国民党占据13席。参见张玉法:《民国初年的政党》,长沙:岳麓书社,2004年,第223页。

⑲《谢汝翼致大总统等密电》(1913年12月18日)、《李鸿祥致大总统等密电》(1913年12月19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兵变》,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0、61页。

⑳《云南代表杨友棠等致一全大会秘书处报告》(1924年1月28日),中国国民党汉口档案:12901。

㉑李根源辑:《永昌府文征》(修订版)第8册,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8年校注本,第2721页。

㉒《云南代表杨友棠等致一全大会秘书处报告》(1924年1月28日),中国国民党汉口档案:12901。

②③《李宗黄上中执会报告》(1927年2月27日),中国国民党汉口档案:12903。

②④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上),第154页。

②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418、475、422、423、464、495、498页。

②⑥崔之清主编:《国民党政治与社会结构之演变(1905-1949)》(上编),第211页。

②⑦段公章、邱捷:《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军阀》,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71页。

②⑧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87-88页。

②⑨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续云南通志长编》(上),第357页。

③⑩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史述》第2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94年,第180-181页。见崔之清主编:《国民党政治与社会结构之演变(1905-1949)》(上编),第212页。

③⑪崔之清主编:《国民党政治与社会结构之演变(1905-1949)》(上编),第213页。

③⑫《云南代表杨友棠等致一全大会秘书处报告》(1924年1月28日),中国国民党汉口档案:12901。

③⑬黄兴:《黄克强手札》,《近代史资料》1962年第1期。

③⑭《云南代表杨友棠等致一全大会秘书处报告》(1924年1月28日),中国国民党汉口档案:12901。

③⑮《云南代表杨友棠等致一全大会秘书处报告》(1924年1月28日),中国国民党汉口档案:12901。

③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333页。

③⑰崔之清主编:《国民党政治与社会结构之演变(1905-1949)》(上编),第222-224页。

③⑱《李宗黄上中执会报告》(1927年2月27日),中国国民党汉口档案:12903。

③⑲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上),第260页。

④⑰李宗黄:《李宗黄回忆录》第3册,台北:中国地方自治学会印行,1972年,第93页。

④⑱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续云南通志长编》(上),第357页。

④⑲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262页。

④⑳《云南现状报告》(1927年2月2日),中国国民党汉口档案:12904.1。

④㉑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1229页。

④㉒《云南代表杨友棠等致一全大会秘书处报告》(1924年1月28日),中国国民党汉口档案:12901。

④㉓《云南代表杨友棠等致一全大会秘书处报告》(1924年1月28日),中国国民党汉口档案:12901。

④㉔杨大铸:《中国国民党云南革命小史》,《云南党务》第1卷第10期,1939年,第7页。

④㉕《云南代表杨友棠等致一全大会秘书处报告》(1924年1月28日),中国国民党汉口档案:12901。而据杨大铸所论,被杀者有6人,即马骧、刘古愚、鄯仕周、李成武、李梧、崔铁君。参见杨大铸:《中国国民党云南革命小史》,《云南党务》第1卷第10期,1939年,第7页。

④㉖杨大铸:《中国国民党云南革命小史》,《云南党务》第1卷第10期,1939年,第7页。

④㉗崔之清主编:《国民党政治与社会结构之演变(1905-1949)》(上编),第326-327页。

④㉘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第3-4页。

④㉙李宗黄:《李宗黄回忆录》第2册,第301-305、313、319页。

④㉚杨大铸:《中国国民党云南革命小史》,《云南党务》第1卷第10期,1939年,第7页。

④㉛李宗黄:《李宗黄回忆录》第3册,第82页。

④㉜陈旭麓等主编:《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81页。

④㉝杨大铸:《中国国民党云南革命小史》,《云南党务》第1卷第10期,1939年,第7页。

④㉞李宗黄:《李宗黄回忆录》第3册,第96页。

④㉟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第39页;另见该页注释一。

⑤⑰李宗黄:《李宗黄回忆录》第3册,第91、103页。

⑩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续云南通志长编》(上),第357页。

⑪李宗黄:《李宗黄回忆录》第3册,第127页。

⑫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续云南通志长编》(上),第357页。

⑬李宗黄:《李宗黄回忆录》第3册,第128页。

⑭李云汉主编:《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组织工作》(上),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会,1993年,第100页。见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第39页。

⑮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第39页。

⑯杨大铸:《中国国民党云南革命小史(续完)》,《云南党务》第1卷第11期,1939年,第7页。

⑰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共云南地方史》第1卷,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6-42页。

⑱《王复生杨蓝春入滇工作经过及滇省党务概况》(1927年3月),中国国民党汉口档案:12904.2。

⑲张若谷、李表东:《一九二六年“倒唐”回忆录》,《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3期,第93页。

⑳《王复生杨蓝春入滇工作经过及滇省党务概况》(1927年3月),中国国民党汉口档案:12904.2。

㉑《云南现状报告》(1927年2月2日),中国国民党汉口档案:12904.1。

㉒《王复生杨蓝春入滇工作经过及滇省党务概况》(1927年3月),中国国民党汉口档案:12904.2。

㉓张禄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派遣的云南省党部筹备员,原件称其为张服真,后面原有“王复生、杨蓝春三同志”字样,但后用毛笔划去,故应仅为张服真一人。参见《中执会致张服真函》(1926年3月21日),中国国民党汉口档案:4367。

㉔《王复生杨蓝春入滇工作经过及滇省党务概况》(1927年3月),中国国民党汉口档案:12904.2。不过,另有资料表明,张禄其后一直参与了国民党在云南的活动,1928年还是国

民党中央派遣到云南的“云南省党务指导委员会”9人委员之一。参见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续云南通志长编》(上),第357页。

㉕杨大铸:《中国国民党云南革命小史(续完)》,《云南党务》第1卷第11期,1939年,第7页。另见张若谷、李表东:《一九二六年“倒唐”回忆录》,《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3期,第94页。

㉖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共云南地方史》第1卷,第41-43页。

㉗《一个报告——赵文涛与云南学生代表毕昌杰同学的谈话(党务情形)》(1926年×月8日),中国国民党五部档案:11658。

㉘《王复生杨蓝春入滇工作经过及滇省党务概况》(1927年3月),中国国民党汉口档案:12904.2。

㉙《云南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工作报告》(1938年,具体日期不详),中国国民党特种档案:特6/31.2。

㉚《王复生杨蓝春入滇工作经过及滇省党务概况》(1927年3月),中国国民党汉口档案:12904.2。

㉛《特派云南省党部筹备员王复生等上中执会呈》(1927年1月28日),中国国民党汉口档案:12972。

㉜转引自马齐彬主编:《国共两党关系史》,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第81页。

㉝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第24页。

㉞《云南省农民协会为本次会议被捕宣言》(1926年,具体日期不详),中国国民党五部档案:13067-2。

㉟《云南省妇女部工作报告》(1927年4月13日),中国国民党五部档案:11241。

㊱《李宗黄上中执会报告》(1927年2月27日),中国国民党汉口档案:12903。

㊲段金生:《脆弱的统合之基:抗战前国民党在云南的组织与发展(1927-1937)》,《民国档案》2015年第2期。

㊳《云南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工作报告》(1938年,具体日期不详),中国国民党特种档案:特6/31.2。